

15.16

陽信文史資料

第三輯



yt/27/23
阳信文史资料

第三辑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政协阳信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元月

封面题字：张廷俊
篆 刻：王炳洪

阳信县文史资料
阳信县印刷厂印刷
印数：1——1200

目 录

阳信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

薛汉三烈士传略

.....杨书绅 1

我在草岚子监狱的前前后后

.....冯乐进 5

阎容德传略

.....王景华 30

惠隆桑梓——劳之常在阳信

.....吴长青 35

忆先父劳之常

.....劳同庆 39

曹广勋和《医学简明录》

.....《医学简明录》整理组 45

眼科名医张皆春

.....劳玉环 张庆刚 49

渤海四专署的医疗卫生机构在阳信

.....张秉志 54

回民连的初建和发展

.....孙广泽 供稿 陈 辉 整理 61

忆阳信公安局的建立和剿匪平乱斗争

.....韩凤祥 供稿 魏 健 整理 69

刘庙回民与南北清真寺

.....陈 辉 整理 78

简谈天主教在阳信的传播

.....张金三 83

关于阳信天主教的一点情况

.....宗怀德 87

古籍中关于钩盘河的记载

.....刘心正 郭继勤 91

“马四”落网记

.....王海涛 100

击毙陈复昌

.....王海涛 110

阳信县政协文史资料征集提纲

..... 114

阳信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

薛汉三烈士传略

杨书绅

薛汉三，字士杰，山东省乐陵县东关人。1931年毕业于乐陵中学，随即考入梁漱溟在邹平县创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为第一期学员。毕业后，于1933年到乐陵五区（王家集）创办“民众学校”并任教员。“民众学校”招收的对象是当地无力升学的高小毕业生，对学生灌输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1934年薛汉三推荐该校毕业生王道和考入省乡村建设研究院（在荷泽县）。1937年1月，王道和与薛汉三一道被分配来阳信第六区（洋湖）创办“乡农学校”，由王道和任校长，薛汉三任教员。同年6月，由五区（流坡坞）“乡农学校”校长李福如（原名李健）介绍加入中国共

产党。从此，薛汉三同志受中共乐陵中心县委书记杜步舟同志委派，以第六乡校壮丁队指导员的身份，负责阳信六区和乐陵五区党的工作。薛汉三同志与孙全祥（即孙清野），李清林、李书亭（省委派出的联络员，现名李干）一齐负责壮丁队的训练工作。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发展武装力量，党组织将壮丁队改造成为一支抗日武装。

“七·七”事变后，平津相继沦陷，日寇大举南侵，占领沧州后，沿庆（云）惠（民）路进犯济南。1937年9月初，薛汉三与王道和率第六乡壮丁队百余人奔赴流坡坞，与第五乡校壮丁队配合，埋伏在公路西侧，截击南侵的日寇。但因寡不敌众，被迫撤往八里泊，与日伪展开游击战。后党组织决定留一部分同志在当地继续开展救亡工作，一部分同志调往黄河以南。薛汉三同志参加了乐陵“救国会”，任锄奸部长。1938年9月，八路军抗日挺进

纵队司令兼政委肖华率部进驻乐陵，原县长牟宜之响应我党共同抗日的主张，愿与我八路军合作。10月，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洪烈来到乐陵，欲将牟宜之带走。薛汉三发动千余群众在公路上，阻止沈洪烈车队通行，并高呼：“坚决拥护抗日的牟县长！”“坚决挽留牟县长与乐陵人民共同抗战！”沈洪烈慑于群众的声威，只好将牟留下，自携随员溜走。

1939年1月，薛汉三担任乐陵县四区（寨头堡）区委书记兼动委会主任。10月初，调任阳信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此时，惠阳支队与阳信游击队合并为阳信县大队，薛汉三兼任大队长。不久，在他的领导下，拔除了洋湖的伪区公所，抓住了伪区长史宝生和伪乡长史秀清。12月12日，在地下党员吕捷等人的配合下，薛汉三率领一支小部队，于水落坡的大郑一带，除奸八人，大灭了敌人的气焰，抗日军民无不拍手称快。

薛汉三同志立场坚定，刚正不阿，对党的工作严肃认真，在抗日救亡活动中，他依靠和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勇敢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与敌人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并常亲自处决特务、汉奸。敌人人为之丧胆，称他为“薛阎王”。1940年3月，薛汉三调济南工委做敌军工作。1943年春天，他奉命回新海县（今黄骅县）向中共冀鲁边区党委汇报工作，途中突然遇到日军“扫荡”，在新海县境内的毕家王坟一带不幸遇难。

我在草岚子监狱的前前后后

冯 乐 进

我是山东省阳信县商店镇冯家店村人，1908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里，8岁上学，读完了小学后又在惠民读高小三年毕业。家中土地不多，父亲经常出村打短工，我便领着七八岁的弟弟，天天在地里干活。那时候，军阀混战，农民受难。北洋军阀张宗昌，在山东组织直鲁联军，自任司令，横征暴敛，一年预征三年钱粮；再加上旱涝风雹飞蝗等自然灾害，年年歉收；因此，我深感农民之苦，经常对于农民的出路和自己的前途陷于苦闷之中。

我村有个人叫开连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法国当过华工，大战结束后回家曾路过苏联。他常说到：“俄国革命成功了，共产党是穷人的党……能给穷人当家作主……”当时

我虽然不知道“共产党”是咋回事，但在村里经常听到这种议论，慢慢地便在思想上产生了一些影响和启发。

后来弟弟渐渐能劳动了，我便去天津另找出路。我挑着挑子当货郎，卖过杂货；在电车上还当过售票员。1927—1928年两年间我才挣了60元钱，别无出路，只好回家。回来后，父亲不满意地说，还不如在家当长工种地合算。但是，那时天津电车公司里有工会，听老乡说其中有共产党。在这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中国，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候，他们敢于揭露国民党社会制度的黑暗，宣传苏联社会制度的优越，并组织工人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从老乡那里我经常看到一些这方面的传单和小册子，但始终没有接上头。

从1929年春天，我在商店街小学教书。后来又考入阳信师范，1932年毕业。那时，我从

进步教员那里，就知道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但是，蒋介石背叛了这条宗旨。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占领我东北三省，全国掀起了抗日高潮，师范也停了课。我痛恨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思想上向往共产党，希望加入共产党，在阳信和惠民的所有学校和机关里，到处寻找党；找那些进步的教师或开明人士谈观点，谈对国家兴亡的看法，谈报国之志。但是，最后还是失望了。因为他们只是同情，并没有多少共鸣，更谈不上有什么扶国济民的组织。于是，1933年春节后，我为了找到党，第二次离家出走去天津，随后又转到了北平。

1933年初，日寇侵略我山海关及热河一带。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率部和东北军在长城及热河一带抗击日寇后，正驻扎在平津一带。东北军少帅国民党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兼北

平军分会主任张学良的队伍也在那里。当然，北平主要还是张学良的势力。我到北平去的时候，张学良正以北平宪兵司令部的名义，在地处帅府园的“宪兵学校”（现北京美术学院址）里招考宪兵，学制一年。我当时生活正极度困难，见这是个住下找党的机会，便毅然报考，不久便被录取了。

宪兵学校里的领导和教官多数是东北人，“九·一八”事变后家乡相继沦陷，亲人生死未卜，大家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反映强烈。认为国家危在旦夕，人民有家难奔，甚至连祖坟都丢了，南京政府又不让抵抗等等。每到逢年过节会餐时，有的军官就借酒发泄大骂南京政府，甚至抱头痛哭。所以校内抗日反蒋的气氛十分高涨。并且校内每星期六还有个“演讲会”，讲的内容广泛，民主性很强，对人们没什么限制。我地下党组织经常借此宣扬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对学生

思想也影响很大。我见此情景，也比较敏感，便主动接近进步分子，因此，开学约两个多月后，便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就是地下党支部书记陈造同志。他是辽宁新民县人。文革十年浩劫时造反派去找他，他也还记得曾介绍我入党。1933年5月，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日，7月间党要派我去工作，但是不久，他们在蒋介石与日寇的联合进攻下失败了，我没去成。不久，我北平地下组织被破坏，1933年底，我和陈造等四名同志同时在毕业见习中（东四12条分队，宪兵学校老校址）被捕。至此时为止，我在宪兵学校里只是当了10个月的学兵。

那时，北平宪兵司令部执法科对于我们这些政治犯，想重重地判刑，以警民众。司令邵文凯却说：“一些青年学生有多大罪，要判这么重？”执法科又想将我们无罪释放，邵文凯

又说不好向蒋介石交代。就这样反复改判了几次，最后的结果则是“判陈造监禁五年”，我们其余三人则“判刑两年半”。就这样，我们这四名政治犯就被关进了北平北新桥东北方向的国民党“陆军监狱”。

陆军监狱是封建清廷灭亡前遗留下来的老监狱，在北平有着最出名的“近代化”设施。大汉奸汪精卫早期参加暗杀清摄政王载沣时被捕，就在此关押过。后来，察绥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兼北路前敌总指挥共产党员吉鸿昌被捕后，于1934年底，也在此就义。

我们被捕那时候，陆军监狱关押着囚犯千余名。我们这三十来名政治犯中有些人认为：共产党好是好，就是太危险了，往后的利弊尚待权衡；里面也有些人逐渐地害怕起来，后悔不该参加共产党；然而我们立场坚定的十几个人，入狱后则借放风之机互相接触，沟通思想，互相激励，坚定信念，集中活动。

我们这些人首推前唐山市委书记董德华为领导人。他已经入狱三四年了，和我关系最密切。其次是杨飞麟，湖南湘潭人，捕前是唐山市党委秘书长，曾在莫斯科学习三年。另外还有胡云先、刘子令、李有山等人。在那时，凡是社会上公开出版的书籍都不算“禁书”，所以，狱中的同志便托人买了些进步书籍，送进来在董德华和杨飞麟的带领下一起学习，用理论指导思想，以求进步提高。

一年后，也就是1935年6月，沧县刘格平也关了起来。他因年前曾在庆云县领导过马颊河暴动而被捕，判了无期徒刑。当时狱中生活很苦，大家都吃不饱，因此刘格平要发动闹伙食。开始时并没有多少响应者，由于我是狱中支部成员，后来他就反复给我作工作，我被他说服了。当然也有人劝我别闹了，刑期两年半，这都快而年了，还闹啥？这些我也没有听。我们首先在政治犯中寻找积极分子，酝酿

串连，宣传鼓动，从十几个发展到几十个，100个，200个……就这样，久久积压在群众中的怒火，终于爆发了。我们向监狱长公开提出：必须改善伙食，不准克扣囚粮，我们不吃这些有老鼠屎的窝窝头……最后还以绝食相抗争。监狱长（上校）怕事闹大不好交代，只好答应要与我们当面谈判，刘格平和我也就成了谈判代表。

谈判中监狱长由于大家的压力，说：“兄弟我佩服你们的为人，我愿和弟兄们交个朋友。我在这里是混事当差，咱们之间又无仇无恨的，也不要太过不去了。以前对你们照顾得不够，以后咱夏天放长风，冬天生炉子，并且让政治犯吃细粮。口粮不够，还可以从我的薪金里加一些……”我们说：“光给我们政治犯吃细粮不行，我们都是犯人，要所有的犯人都吃细粮。”这样一来，监狱长就以“不敢自作”为由拒绝了，光说向上级请示，而一拖再